

青年医生形象的媒介话语建构： 从语言偏见到信任危机

朱桂生 黄建滨

（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摘要]以刘永伟“肾失踪”事件的相关报道作为分析对象，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探讨了新闻媒体所建构的青年医生群体形象、媒体在建构青年医生群体形象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以及医生群体形象背后所呈现的社会文化语境。研究发现，在“肾失踪”事件中，新闻媒体通过标题、分类、文本架构、互文性等手段将青年医生群体塑造成一种缺乏经验、冷漠傲慢、不负责任的施暴者形象。对青年医生群体的污名化与中国社会因转型带来的信任危机以及因社会虚拟化导致的群体责任意识下降等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肾失踪”；青年医生形象；批评性话语分析；信任危机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8）03-0012-07

一、研究缘起：正常社会现象下的残酷现实

2016年5月5日，安徽省《新安晚报》以《我的右肾去哪了》为题，报道了宿州患者刘永伟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完胸腔手术后右肾“离奇”失踪这一事件。该篇报道刊发当日，就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各大网络平台纷纷对此事进行了转载、转发，一些知名网媒平台，如澎湃新闻网、搜狐新闻网、中国青年网等更是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一时间，“患者术后右肾离奇失踪”引爆了中国舆论，涉事的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以及青年主刀医生胡波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该事件的一系列后续报道中，公众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了患者，在一些网络平台以及自媒体空间，更是充斥着对医院、青年医生群体的攻讦、谩骂和侮辱之声。显然，在这一医患纠纷中，医生尤其是青年医生群体被彻底污名化了，青年医护群体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当前，每当有医患纠纷见诸报端，必能引起公众的围观，其间不乏夹杂着同情、失望、迷茫甚至愤怒的声音。然而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医患纠纷是现代医疗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普遍存在于医疗体系完善、医疗技术发达、医院管理先进的欧美国家^[1]。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重且复杂的，

[收稿日期] 2018-03-15

[作者简介] 朱桂生，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话语分析；黄建滨，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话语分析。

其一部分源于医护人员言行或措施不当以及医疗设备落后、不合理等医源性因素，另一部分则源于患者本身的误解以及社会群体的偏见等非医源性因素^[2]。令人唏嘘的是，医生尤其是年轻的医护群体往往会因为这种多源且正常的社会现象——医患纠纷而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公众苛责和辱骂的对象。更为残酷的是，今天中国的年轻医护群体，不但要忙于提升自身的医术以此来医治各类病患，还要腾出相当的精力来应付各种医患纠纷以及暴力伤医事件^[3]。大量事实证明，正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对相关医患纠纷进行片面、失实、偏见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公众，从而使公众形成了“医生不可信、（年轻）医生无经验”的可怕认知^[4]。可以说，一些受利益驱使而妄图制造轰动效应的逐利媒体应为今天青年医生群体的污名化负责。显然，引导公众洞悉相关医患纠纷报道背后的歪曲和偏见是十分有必要的，一方面可消解公众对青年医生群体的误解和污名，另一方面则有助于缓解医患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有鉴于此，笔者收集了各大媒体对此次“肾失踪”事件的相关报道，自建样本容量为3万余字符的小型语料库，并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肾失踪”的相关话语进行研究，以期回答如下问题：在此次“肾失踪”事件中，新闻媒体建构了怎样的青年医生形象？它们是通过怎样的语言策略建构起这种形象的？医生尤其是青年医护群体形象建构的背后又是源于怎样的社会文化语境？本文将利用费尔克劳（Fairclough）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理论，解构新闻媒体中涉及“肾失踪”事件相关报道的文本特征以及语言策略，探究其建构的青年医生群体形象，并以此剖析其呈现此种形象的深层社会缘由。笔者认为，此项研究将有助于唤醒公众对相关“话语陷阱”的批评意识，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众对一些隐蔽性语言偏见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进而促进公众对医生尤其是青年医护群体偏见以及污名的消解。

二、理论基础：批评性话语分析及费尔克劳的三维分析理论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是一种从语言学角度对语言实践进行社会分析的研究方法，其基本的语言学理念是语言实践具有社会性：语言不仅反映社会，同时参与着社会的建构^[5]。以此为出发点，CDA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并非是任意的，而需受到历史、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影响。因此，语言并不是一种传递信息、表达思想的透明媒介，相反，语言中总是隐藏着微妙的让人觉得理所当然的社会、政治或种族意义^[6]。所以，CDA的主要目的在于揭露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尤其注重将隐藏在语言内部已自然化、合法化的偏见、歧视、不公正、不公平等因素从语言中剥离出来，进而促进语言中权力关系的去神秘化^[7]。

CDA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它不仅汲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克里斯蒂娃（Kristeva）互文性理论的精髓，同时还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其重要的分析工具^[8]。CDA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其分析框架和理论的多样性。目前，在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方法有四种：Fairclough的社会文化分析法^[9]，福勒（Fowler）的批评语言学^[10]，沃达克（Wodak）的语篇—历史法^[11]以及梵·迪克（van Dijk）的社会认知分析法^[12]。这四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模式对语言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其中，Fairclough的社会文化分析法被学术界公认为CDA中最系统、最完善、最强有力的社会批判分析工具^[13]。社会文化分析法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种社会实践，而所有的社会实践都与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紧密相关，文本则是语言参与社会实践互动的最终结果^[14]。因此，话语或任何一个话语实践都应该是一个由语言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构成的三维统一体。在此基础上，Fairclough提出了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描述—阐释—解释，即描述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阐释文本的生成过程，解释社会文化语境对文本生产和阐释过程的制约以及生产和阐释过程转而对社会语境的影响^[15]。

鉴于Fairclough三维批评分析框架的系统性、完善性以及与本研究的高度契合，本文将依托该框架对新闻媒体中刘永伟“肾失踪”事件的相关报道作如下探讨：在文本层面，从文本标题、分类、文本架构等角度描述语言特征；在话语实践层面，从互文性角度阐释文本的生产过程；在社会实践层面，结合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对文本的生产进行探讨和解释。

三、对刘永伟“肾失踪”事件相关报道的三维批评性话语分析

（一）文本分析

Fairclough的三维批评分析框架认为，话语的文本分析可从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架构等层面展开，

其具体分析过程可涉及标题分析、分类、及物性、主被动语态以及衔接手段等内容^[16]。当然,文本生产会因呈现意识形态需要的不同而凸显出不同的语言特征,因此,对文本分析并非需要囊括前述所有层面^[17]。鉴于此,本研究将选定“肾失踪”相关报道中较为典型的语言特征如标题、分类以及文本架构作为文本分析的主要内容。

1. 新闻标题的批评性解读

一般认为,新闻标题是新闻中最重要、最有价值事实的浓缩和概括。因此,新闻标题具有独立传递信息的功能^[18]。可以说,新闻标题是新闻报道的“眼睛”,它不仅反映了文本生产者的观点和立场,更重要的是,它引导了公众阅读和理解文本的方式^[19]。因此,对新闻标题的批评性解读不仅能有效揭示文本生产者真实的态度立场,同时,也能引导公众避免落入一些精心编织的“话语陷阱”而浑然不觉。

笔者发现,大多数报道“肾失踪”事件的新闻标题,如:“男子手术后右肾失踪,当事医生:瞬间萎缩了”“男子手术后右肾失踪,医生逃避患者质问惊天内幕将揭晓”“我的右肾去哪了”“农村男子手术后右肾失踪变废人,医生荒唐解释:右肾瞬间萎缩”“做完胸腔手术,右肾离奇失踪”“宿州男子术后右肾丢失事件背后真相,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手术过程中做了什么手脚”“男子手术后右肾失踪,无奈报警”等,都带有极为恶意的内容预设。内容预设反映了新闻媒体拟想中的格局,即哪些信息应被强调,哪些信息应被忽略,报道的重点和倾向是什么等^[20]。从上述新闻标题来看,报道此次事件新闻的内容预设是:患者刘永伟在手术前右肾是完好并存在的;患者在医院手术后,右肾失踪;医院对患者右肾失踪的解释荒唐不合理;患者右肾失踪可能涉及刑事案件;患者手术后身体状况持续恶化。显然,这些新闻标题的内容预设极易诱导公众对当事医院及医生做出一些如“医生故意隐瞒医疗事故”“病人肾脏被医院盗摘倒卖”等恶意揣测。显然,在这些媒体恶意新闻预设的“助力”下,医院和医生极易成为公众谩骂的无辜牺牲品。

此类恶意内容预设的危害极为严重,其原因在于媒体经常利用自身信息交流的强势地位,把自己的内容预设强加给公众,并不断用内容预设制造公众的阅读预设。经过媒体的长期“培养”,公众的阅读预设逐渐演变为一种生活预设,进而发展出一种集体无意识^[21]。可以说,文本生产者制造的一些恶意新闻预设应为当今社会存在的对青年医生群体的偏见、歧视、污名、误解等承担一定的责任。

2. 分类分析

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三大纯理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分类不仅是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主要方式,更是实现语言概念功能的主要手段:人们通过选择不同的词汇对外部世界进行分类,从而赋予其意义和秩序^[22]。然而,语言并非是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受不同认知水平和态度情感的影响,人们赋予事物以意义和秩序的过程并不总是公正和真实的。可以说,文本的生产过程其实是一个词汇选择的过程,文本生产者总是面临着一个如何选择词汇并借此来表达意义的问题:不同的词汇选择不仅反映了主客观世界中的人、物、行为和事件,更重要的是,选择不同的词汇会因此建构出不同的人际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判断^[23]。CDA就认为,通过词汇选择是大众传媒给予事物不同分类的惯用手法,也是其制造歧视和偏见的主要途径^[24]。由此可见,对文本词汇选择策略的探讨在揭示文本生产者态度立场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媒体对刘永伟“肾失踪”事件的相关报道中,笔者发现,大多媒体都采用了一种过分词化的词汇选择策略对事物进行分类和描述。在CDA中,过分词化通常表现为相同/相近词汇密集出现并反复描述同一事物,其作用在于凸显被修饰客体的某些特征,并由此引发受众的广泛关注。因此,通过对修饰词以及被修饰客体的剖析,可极易明晰话语生产者的主观意识和态度立场。通过检索自建语料库,笔者发现,作为被修饰客体,此次事件的当事人——患者刘永伟被一些带有明显消极语义韵的词汇如“不能够走路的”“不成形了”“无奈的”“沮丧的”“离死不远的”等重重包围;另一当事人——青年主刀医生胡波则被“掉头就走”“回答不上来”“难辞其咎”“拒绝回答”“冷漠地”等话语反复描述;而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右肾”则被“莫名其妙消失的”“离奇消失”“天方夜谭”“蒸发”“瞬间萎缩”等话语密集修饰。不难发现,这些重复且密集出现的修饰语把“肾失踪”事件塑造成了这样一种景象:在此次事件中,患者刘永伟右肾的“失踪”是离奇、有违常理的;患者是可怜、值得同情的;而年轻的主刀医生则是冷漠、无经验、不负责任的。显然,这种情形的建构体现了大多媒体的态度立场,即在医患纠纷中,永远存在着医生与患者的二元对立:医生是强势、冷漠傲慢的,而患者则是弱势、孤立无援的。无疑,媒体的这些极具偏

见性话语以及特殊的形象建构必将加重医患双方的误解和矛盾，极易诱导公众对一些正常的医患纠纷作出非理性判断，进而加剧社会对医生群体的污名化以及无理性攻击。

3. 文本架构分析

CDA 借鉴并吸收了 Halliday 的语篇功能理论，并将其改造为强有力的话语分析工具，考察文本架构是批评性话语分析从语篇功能角度呈现语言偏见的重要手段^[25]。通过对文本内容的不同架构，文本生产者能够容易地使文本中某些信息“被前景化”或“重视”，而另一些信息则被“背景化”或“忽视”。可以说，作为呈现文本内容的一种特殊方式，文本架构体现着文本生产者的视角和态度立场。因此，CDA 揭露文本生产者意识形态和偏见的一种有效方式便是考察文本内容中相关信息的“前景化”和“背景化”^[26]。

在此，本文仍以《新安晚报》2016年5月5日发表的题为《我的右肾去哪了》的文章为例进行架构分析。据该文报道，2015年6月19日，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对患者刘永伟实施了紧急手术。但令人奇怪的是，该篇文章对此次手术的紧急性、重要性、困难程度以及手术中医护人员对患者本人的精心救治和照顾等信息着墨甚少甚至直接忽略。相反，该文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手术后患者刘永伟本人身体的创痛、虚弱以及青年主刀医生胡波“掉头就走”的冷漠态度。显然，在此篇报道中，被前景化的信息是手术给患者带来的严重伤害以及医生拒绝与患者进行沟通的傲慢与冷漠。遗憾的是，医院医生对患者紧急的救治、手术对挽救患者生命的重要性、医患双方的前期沟通、之前车祸对患者本人的严重伤害以及手术可能引起的并发症等信息都被背景化了。不难发现，文本生产者对大量有利于医院、医生的信息都进行了刻意的回避与隐匿，因此，通过这样一篇报道，公众能接收到的信息就是：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对刘永伟手术过程中存在重大医疗事故，给患者本人造成重大伤害；涉事青年医生态度冷漠、傲慢，对此事置之不理。

（二）话语实践分析

CDA 认为，话语实践是对话语生产和理解过程的阐释，是将文本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中间纽带。对话语实践层面的探讨，离不开对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深度剖析^[27]。在此，本文将讨论媒体是如何通过互文性策略在有关“肾失踪”话语的生产过程中传递态度立场以及呈现偏见的。

法国符号学家 Kristeva 在其 1969 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28]。她认为，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的，都是对其他语篇的改造和吸收^[29]。互文性是新闻话语的一个典型特征，因为大多数新闻报道并非基于文本生产者亲临现场或直接目击，而更多的是依靠对不同渠道以及不同类型话语的借鉴和引用。可以说，互文性贯穿了新闻话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因此，对文本互文性进行分析逐渐成为 CDA 揭示文本生产者意识形态、偏见、歧视的一个重要手段。引语是互文性的典型特点^[30]，因此，对文本引语的考察有利于明晰媒体在此次“肾失踪”话语生产过程中所持的态度立场以及隐匿其中的各种偏见。

在此，本文将从直接引语的角度对相关报道的互文性特征展开探讨。直接引语是指直接引用别人的话语来描述某个事件，其目的在于增强文本的客观性，给受众营造一种真实、不偏不倚的感觉。可以说，在文本生产过程中，直接引语的选择是文本生产者隐含态度的直接表达^[31]。通过仔细阅读“肾失踪”事件的相关文章，笔者发现在众多报道中，“说话人”即信源多为患者刘永伟，而当事的另一方——医院及医生胡波大多数时间处于失声状态。不难发现，文本生产者意欲向公众传递的所谓真相几乎是由患者一人的话语所建构起来的。例如：（1）刘永伟告诉记者：“（医院）负责人说，‘我希望你不要来找我……’”（2）刘永伟说：“我的左肾现在也开始受影响了……到那时候，我真的就完了。”（3）刘永伟说：“但愿这次去派出所能有点用。要不然再来几次，我估计都见不到真相出来的那一天了。”文本生产者用直接引语呈现“右肾失踪给患者带来严重伤害”以及“患者投诉无门”的例子在“肾失踪”的相关报道中不胜枚举，其目的当然是让公众相信：在医患纠纷中，患者所有的苦痛都是医院/医生造成的；在医患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医院往往是蛮横无理的，而患者则是弱势无助的；而媒体的报道只不过是直接引用，因此是真实可信、不偏不倚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此次“肾失踪”事件的相关报道中，大多数媒介平台忽视了新闻报道中应有的平衡法则，仅仅重视了患者刘永伟的声音。当然，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有关此次事件的不同立场得不到应有反映，事件的具体过程或细节得不到公平呈现，受众当然也接收不到事件的全面信息。除此之外，有些直接引语的呈现可以说是别有用心，例如：（4）一个

拍CT的医生说：“如果右肾还在，哪怕是变得像芝麻粒，我都能给你照出来……”（5）（医院）负责人：“从手术记录看，你的右肾在手术之前显示是挫伤的……医生拿了这个破损的肾去也没有用吧？”这两句直接引语看似是文本生产者客观地呈现了医院对患者“右肾缺如”的专业解释，即“因先前挫伤而逐渐萎缩”。但不难发现，这两句引语极易诱导公众去作恶意揣测：其一，医院之前的解释是自相矛盾不可信的，因为连拍CT的专业医生都承认“即使（右肾）像芝麻粒，（机器）也能拍出来”。可见，医院“右肾因伤逐渐萎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二，医院存在盗摘患者肾脏的嫌疑。因为连医院负责人都承认“医院拿了个破损的肾也没有用”，那么，如果患者的肾脏“正常有用”，医院是否会去“拿”呢？从自建语料库中，笔者发现，在众多“肾失踪”的相关报道中，一些容易诱导公众进行恶意揣测的直接引语比比皆是，文本的生产者们娴熟地利用互文性策略对“患者孤立无援”“医生蛮横霸道”“（医院）解释有违常理”等信息进行无限放大。无疑，这些直接引语极易诱使公众去质疑医院和医生群体的职业道德及专业素养，从而造成了对医生尤其是青年医护群体污名和不信任的泛化。

（三）社会实践分析

在社会实践层面分析媒体报道中的话语偏见，就是要考察哪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结构或社会权力关系影响或决定着话语偏见的产生，以及话语偏见又是如何维系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32]。在CDA中，文本分析和话语实践分析均是为社会实践分析服务的，社会实践分析的主要内容即为意识形态分析和社会文化语境分析。从“肾失踪”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和话语实践分析中不难发现，大多媒体在此事件中呈现出一种“（年轻）医生不可信”的态度。众多媒体将医生群体刻意塑造成一种“冷漠”“傲慢”“不负责任”“不可信”的负面形象，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对青年医生群体铺天盖地的谩骂、中伤、丑化既是一种社会信任缺失的外在表现，也是一种社会信任缺失的深化发展^[33]。当代中国社会不仅面临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风险，同时还面临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动所带来的风险。身处这种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个体面临的风险、决策以及认知的不确定性急剧增加^[34]。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高度分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明确，每个人都致力于自己的行业而对其他行业知之甚少。这种知识隔离的现实必然导致社会凝聚功能降低、社会分解加快等严峻后果。因此，在医患纠纷中，由于医疗专业知识的缺乏，在医疗风险面前，公众自我掌控、决策以及认知能力会进一步弱化，进而产生对医生群体尤其是年轻医生的不信任、反感甚至横加抵制。

其次，现代社会信息化张力强化了对医生群体的污名效应^[35]。在现代社会，互联网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生活的各个层面，公众的生活方式也因此而出现极大的改变，社会虚拟化程度进一步加剧。由于社会的虚拟化逐渐地削弱着对个体的掌控，因此在社会现实中，个体的责任意识不断地弱化和下降，这一严峻社会现实直接导致了一些歪曲、谣言甚至污蔑等不实信息在虚拟空间迅速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爆炸弱化了公众对信息的理解和把控，在一些新闻媒体富有倾向性和放大效应的报道面前，公众逐渐丧失了辨识力和抵抗力，对网络以及媒体呈现的海量信息更多的是盲从而非批判。反过来，这种对媒体信息的盲从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医生群体的刻板印象，加剧了对医生群体的信任危机和污名化。

再次，对青年医生群体的污名化和信任危机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群体心理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存在着一种极不合理的思维倾向，即认为一切医务工作人员都应具有完美的、有如“道德圣徒”般的人格和道德品质。而一旦医务人员不能满足社会群体的这种心理预期时，其整体情绪往往会走向失望、不满甚至愤恨^[36]。而事实上，作为道德品质承载者的青年医务群体单凭自身的力量是很难维系这一道德诉求的，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群体对医务工作者的期待值远远超出了这一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群体能够承载的阈值^[37]。因此，社会群体在享受医疗服务以及医疗消费过程中所遭遇的一些心理落差也就逐渐成为医务工作者被质疑、辱骂甚至污名化的一个隐形触发器。

还需指出的是，青年医护群体目前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与频繁见诸报端的医源性失误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媒介平台在一些医源性医疗事故报道过程中的特定选题、叙述方式、情感倾向、态度评价等强化了受众对医生群体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显然，在当今的医学领域，医源性失误是无法

避免的，但因为一些媒介力量对此类失误的过度关注以及普通民众医学专门知识的缺乏，这两方因素的叠加极易冲击和瓦解公众对医生群体的信任体系。Slovic 就认为，信任的建立和破坏遵循着一个“不对称法则”，即信任的建立过程非常缓慢，但极有可能在一瞬间被一个灾难或失误所破坏，遗憾的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信任一旦缺失就有可能永远得不到真正恢复^[38]。中国的青年医护群体目前面临的的就是此类令人极为尴尬的社会语境。不得不承认，一系列医源性失误报道的长期累加，亦是造成社会公众对医护群体信任缺失的一个重要且直接的因素。

四、青年医生形象媒介话语建构的思考

依托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本文探讨了新闻媒体对“肾失踪”事件相关报道中的标题、分类、文本架构、互文性和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通过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自下而上的分析，笔者发现，在大多数媒体以及受众眼中，患者刘永伟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受害者，而青年医生胡波则是一个不负责任、冷漠强势的施暴者。然而事后的真相表明，一些大众媒体无论是对患者还是对青年医生形象的特殊刻画都是有失公允、带有极大偏见的。笔者认为，正是当今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风险、专业知识的隔离、信息化张力、传统社会对医务群体的心理预期以及医源性失误的长期累加等诸多社会因素造成了公众对青年医生群体的偏见、污名化和信任缺失。

不可否认，语言并非为传递信息的透明媒介，很多新闻媒体仍然在一些特殊理念、认知、价值取向的操纵下继续生产着对“他者”或“他者群体”的偏见性语言^[39]。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对新闻媒体而言，时间和眼球就是生命。为了争夺时间，新闻媒体会将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传播给受众；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一些媒介平台竞相以奇异、轰动为看点^[40]。而新闻媒体的这类行为极易造成报道对象被受众所误解、怀疑以及污名化。不难发现，在此次“肾失踪”事件中，在报道初期，参与患者刘永伟手术治疗的医院和医务工作者们饱受公众的质疑、攻讦甚至谩骂，对此，一些逐利媒体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一些风险话语尤其是涉及医患纠纷话语的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介应肩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媒介平台应避免刻画单一完美的“道德圣徒”式医务工作者形象，而应将其视为高度职业化、专业化并拥有正常合理诉求的普通公民群体^[41]；另一方面，媒介平台应充分认识到污名化报道可能诱发的严重社会后果，必须做到全面、公正、客观，并尽可能准确地提供事件的相关信息，以免造成受众的误解和主观臆断^[42]。本文对“肾失踪”相关报道作批评性话语分析，其目的正是在于引导公众对此类文本进行批评性解读，认清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歪曲、偏见和不信任，从而帮助公众对青年医生群体有一个公正且正确的认识。

总之，对医生尤其是青年医护群体的偏见和污名化是现代社会信任危机的一种必然表征，对青年医生群体信任重建的过程亦是一个需多重举措共通助力的漫长过程。因此，加强对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风险管控，尤其是网络语言暴力行为的管控，并在促进不同知识领域和专业群体相互沟通的同时，努力构建基于契约精神的信任制度体系，净化网民表达场域，这些措施必将对消解青年医生群体污名化和偏见、重建公众对青年医生群体的信任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侯怀霞. 医患纠纷“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J]. 苏州大学学报, 2015(02): 43-49.
- [2] 周国朝等. 医患纠纷的多重性研究与思考[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2(09): 662-664.
- [3] 邵华. 医患纠纷调解：通过衡平实现正义[J]. 中南大学学报, 2016(01): 42-48.
- [4] 江山、刘新. 媒介建构下的“医生”形象——以《新京报》“医生”报道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 2016(04): 56-57.
- [5] Fowler, R. et al. Language and Control[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 [6] 辛斌、高小丽. 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04): 1-5.
- [7] Lazar, M. M. Equalising Gender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Double Talk[J]. Discourse & Society, 1993(04): 443-465.
- [8] 田海龙. 批评话语分析：阐释、思考、应用[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43.
- [9][15][16][24][27]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58、67、71、72、73.
- [10] Fowler, 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

- [11] Wodak, 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A]. In R. Wodak & M. Meyer(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1.
- [12] van Dijk, T.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 1.
- [13][17][19][23][26][28][32][39] 熊伟. 话语偏见的跨文化分析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 92、101、124、102、138、161、173、202.
- [14] 丁建新、廖益清. 批评语言学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 98.
- [18] 潘艳艳. 美国媒体话语霸权下的中国海上力量建构——基于 2013-2014 年美国“战略之页”网站有关中国海军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J]. 外语研究, 2015 (02) : 7-12.
- [20][21] 徐默凡. 从标题群看新闻预设——以《新民晚报》“民工新闻”为例 [J]. 修辞学习, 2006 (01) : 8-15.
- [22] Halliday, M.A.K.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Arnold, 1985 : 48.
- [25] 辛斌. 批评语言学: 理论与应用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54.
- [29] Kristeva, Julia. The Kristeva Reader[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 1.
- [30] 付小秋、沈红. 叛徒还是英雄? ——从批评话语分析看《南华早报》和《福克斯新闻网》在“斯诺登泄密事件”上的较量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 (04) : 47-53.
- [31] 洪亚星、董小玉. 被仰视的中国: 从文本建构到形象塑造——基于纪录片《超级中国》的批评话语分析 [J]. 新闻界, 2015 (13) : 24-29.
- [33][34][35] 张昱、杨彩云. 泛污名化: 风险社会信任危机的一种表征 [J]. 河北学刊, 2013 (02) : 117-122.
- [36][37][41] 尹洁. 如何解构医患信任危机? [J].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2) : 29-35.
- [38] 曾繁旭、戴佳. 风险传播: 通往社会信任之路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 117.
- [40][42] 董小玉、胡杨. 风险社会视阈下媒介污名化探析 [J]. 当代传播, 2011(03) : 41-43.

**The Stigmatized Doctors: From Linguistic Prejudice to Crisis of Confidence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the News of “the Missing Kidney”**

Zhu Guisheng Huang Jian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 This paper explores three relevant questions: what images the news media have shaped for the young doctors; how they have shaped the images; and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doctor image and socio-cultural context. This paper probes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discourse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based on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news about “the Missing Kidney” from media. It is found that many media have shaped the young doctors as some cold, arrogant and irresponsible perpetrators by the means of news title, classification, framing of text and intertextuality. And it is an admitted fact that the stigmatization of doctors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rings and the decline of group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 social virtualization makes.

Key words : “The Missing Kidney”; the Image of Young Doctor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sis of Confidence

责任编辑 杨 毅